

我国农民工福利贫困测度 及精准扶贫策略研究

孙咏梅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北京 100876)

摘要:精准扶贫策略的研究,不能局限于物质贫困的单一视角,而应突破以劳动报酬和消费为贫困衡量标准的传统方法,引入多维贫困研究理念,构建多指标的贫困衡量体系。福利贫困作为多维贫困中的一种潜在的贫困,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及复杂性,在实践中需要纳入扶贫减贫的视野并加以重视。通过运用 AF 方法对农民工的福利贫困进行综合分析发现,不同维度的福利贫困所反映的问题并不完全一致。对于中度的福利贫困而言,我国新农合和新农保的福利保障程度仍然较低,而在重度贫困下,社会保险和看病问题成为农民工福利贫困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在实践中我国应当以消除福利贫困为重点,积极推进精准扶贫。

关键词:农民工;多维贫困;福利贫困;精准扶贫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6)05-071-10

贫困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共同关注的主题。然而长期以来,人们衡量贫困往往采用收入、消费水平、财富增量等物质指标,很少意识到除物质之外,还存在着福利、能力、精神等方面的影响因素。更有“涓滴效应”理论认为,收入的提高会自然消化掉福利、能力等方面的贫困,即财富的增加会自动消除贫困因素。这种致贫因素分析,简单地将贫困归因于物质匮乏,难以触及贫困的本质,其结果是单纯地追求物质脱贫,使得精准扶贫政策无的放矢。近年来的“脱贫又返贫”的扶贫困境表明,单一的物质扶贫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的。这主要是因为福利保障的极大缺失,阻碍了我们扶贫减贫政策的真正落实。福利贫困本质上是人们从商品中获得不足的一种贫困,从福利这一维度测度农民工贫困,将为更好地贯彻“十三五”规划提出的“精确扶贫”策略,提供了科学的研究依据。

一、福利贫困的理论研究基础及其测度方法

以往人们对福利贫困的研究,基本停留在经济福利的层面上,早期的贫困识别与测度,是基于收入标准,其隐含的假设是:凡是贫困线以上的个体都能够通过市场购买而达到最低功能性的福利水平。在这样一维概念框定下,贫困仅指经济上的贫困,依据一个人维持生计所需的最低收入(或消费水平)即贫困线(阈值)作为是否贫困的标准。^[1]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发现了这种贫困测度的缺陷,认为贫困是对人的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森进而提出了多维贫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理论,^[2]即认为穷人遭受的剥夺是多方面的,包括较差的健康状况,贫乏的教育,不充足的

收稿日期:2016-03-01

基金项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基地项目(13JDJGB036)

作者简介:孙咏梅(1968-),女,辽宁绥中人,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

生活保障,较低的收入水平,有限的赋权,恶劣的工作条件,以及来自暴力的侵害,等等。其中福利的受剥夺程度,是形成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更进一步地,森将贫困的界定作了进一步的延伸,即“贫困——福祉被剥夺——基本需要——能力”。多维贫困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人的贫困除收入贫困外,还包括多重的其他客观指标的贫困和对福利的主观感受的贫困——贫困是与高额的医疗、养老、教育、住房等民生支出,对应的公民获得健康权、养老权、教育权、居住权的能力的缺失。

我国理论界在多维贫困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农民工贫困的现实,对福利贫困的界定做了较好的探索。我国理论工作者倾向认为,福利贫困是支付工资、奖金之外的所有待遇上的贫困,其中包括社会保险在内的贫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农民工社会福利主要是为了满足农民工的社会需求,既包括基本的生存需求,也应包括发展需求;(2)农民工社会福利的提供者是政府和社会,包括政府部门、企业、民间组织在内的社会力量,应在农民工社会福利服务中共同发挥作用,但不包括家庭、亲戚所提供的服务;(3)农民工的社会福利应有相关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以保证农民工社会福利服务的连续性和一致性。^[3]

还有一些学者在制度保障和贫困的度量方面作了探讨。刘家鑫在研究中指出:进城农民工面临着“经济接纳,社会拒入”的社会问题,一个表现方面就是农民工群体社会福利保障的缺失;这种缺失尤其表现在失业保障、医疗保障、劳动时间、住房等维度,展现出农民工群体面临的与城市居民不平等的福利待遇。^[4]其它学者对农民工福利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职业培训和生活诸方面的福利,并且有一部分学者通过相关实地调研,对农民工群体所面临的福利缺失进行了实证研究。^[5]袁方等在量化分析层面上进行对福利贫困的测度,做了有意义的探索。^[6]

从总体来看,农民工福利贫困相关研究仍然存在以下缺陷:对于早期的分析来说,研究者往往着重于福利贫困的某一个特定问题(比如社会保险、医疗条件等)展开论证,并且经常借助社会调查对农民工群体进行简单的统计分析,而这相比于量化研究而言,显得论证较为薄弱,也没有考虑到福利贫困存在多维影响因素。在界定“福利贫困”这个词时,一些学者更强调在社会福利方面所受的剥夺,并将福利贫困等同于整体贫困,因而在福利贫困的测算中纳入了收入、社会歧视等其它非福利指标。如此对福利贫困的分析,实际上与其它维度的贫困混淆在了一起,影响了福利贫困研究的客观性。

为了证实阿马蒂亚·森所提出的福利贫困的存在,本文借助 AF 法来衡量由多个指标构成的福利贫困,以及福利贫困对于整体多维贫困的影响程度,并进一步以我国农民工为样本来源,对福利贫困进行测度,为实现我们的扶贫工作中的“靶向治疗”,提供科学依据。AF 法自从 2007 年被阿尔基尔和福斯特(Alkire & Foster)两位学者正式提出后,很快得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认可,并对其在计算多维贫困指数的应用上起到了推动作用。概括来说,AF 方法主要内容包括了以下三个主要方面。^[7]

(1) 各维度的福利取值

构建一个 $n \times d$ 维矩阵,其中的元素 y_{ij} 表示个体 i 在维度 j 上的取值,其矩阵形式如下:

$$Y = \begin{bmatrix} y_{11} & y_{12} & \cdots & y_{1d} \\ y_{21} & y_{22} & \cdots & y_{2d} \\ \vdots & \vdots & \ddots & \vdots \\ y_{n1} & y_{n2} & \cdots & y_{nd} \end{bmatrix}$$

(2) 福利贫困的识别

各个维度贫困线标准的设定直接决定了样本家庭在相应维度是否贫困(对应赋值分别为 1 和 0),以及贫困的深度。为获得贫困剥夺矩阵,令 z_j 代表第 j 个维度被剥夺的阈值或者贫困线,并且当 $y_{ij} < z_j$ 时, $g_{ij}^0 = 1$; 当 $y_{ij} \geq z_j$ 时, $g_{ij}^0 = 0$ 。借助这一标准对样本矩阵进行赋值,识别每个样本在该维度上是否贫困,得

到如下的贫困剥夺矩阵(G):

$$G = \begin{bmatrix} g_{11}^0 & g_{12}^0 & \cdots & g_{1d}^0 \\ g_{21} & g_{22} & \cdots & g_{2d} \\ \vdots & \vdots & \ddots & \vdots \\ g_{n1}^0 & g_{n2}^0 & \cdots & g_{nd}^0 \end{bmatrix}$$

定义 $c_i = \sum_{j=1}^d g_{ij}^0$, 则 c_i 表示个体 i 忍受的总的贫困维度数。将维度 k 作为考察个体是否贫困的阈值, 并将 ρ_k 作为识别贫困的函数, 当 $c_i \geq k$ 时, $\rho_k(y_i; z) = 1$, 表示个体 i 贫困; 当 $c_i < k$ 时, $\rho_k(y_i; z) = 0$, 表示个体 i 非贫困。

(3) 贫困加总

在识别贫困之后, 最简单的加总方法自然是按人头计算多维贫困发生率(H): $H = H(y, z)$; $H = q/n$ 。其中, q 是在 z_k 之下的贫困个体数(即同时存在至少 k 个维度贫困的个体数)。而为了克服“数人头”方法的不足(对贫困的程度变化敏感度较低), AF 方法提出了一种修正性的多维贫困测量方法: $M_0(y, z) = HA$ 。 M_0 为调整得到的多维贫困指数, 它由两部分构成: 一部分为 H (贫困发生率), 另一部分为 A (平均剥夺份额)。平均剥夺份额的计算和加入分析, 是在贫困发生率的基础上对贫困程度的补充考量, 目的是使贫困加总过程及其结果更加全面。

在 AF 方法的改进方面, 还有对贫困指数 M_0 的进一步补充和修正。不过由于修正后得到的指数更多是为了比较不同时间同一群体贫困程度的变化, 而本文对于这种比较并不关注, 因而本次研究没有将这些内容纳入到计算中。

二、我国农民工福利贫困量化分析: 以建筑业为例

通过对 AF 方法的总结我们可以发现, 对于农民工群体福利贫困的分析, 只有先进行指标的划分, 才能利用多维思路对福利贫困进行衡量和研究。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2014 年我国农民工总数已高达 2.74 亿人, 其中建筑业集中了全国三分之二的农民工, 因此, 本文选取建筑业作为样本来源, 并对全国五个不同省份的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 调查共回收问卷 3000 份, 其中有效问卷 2200 份。

1. 农民工贫困指标与贫困标准的考察

农民工贫困问题涉及到的因素不能仅仅局限于其本身的收入、福利水平和生活状况。实际上, 农民工不仅需要承担外出打工过程中的生活、交通等支出, 他们还是其整个家庭开支的主要承担者。因此, 考察农民工的福利情况, 既要考虑他们个人福利情况是否得到保障, 也要分析他们的家人是否享受了充分的福利保障。对于没有福利保障的家庭来说, 家庭福利开支需要农民工来承担, 这必然会加重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压力, 从而对其真实的贫困程度产生巨大影响。

就农民工个人而言, 一般可以选取两项指标来考察其福利状况: 第一项是农民的社会保险拥有情况。作为社会保障的重要工具, 各类社会保险是个人生活的“安全网”, 是面临突发情况时保障基本生活的关键性力量。同时, 由于目前各类社会保险往往与工作挂钩, 因而有无保险、保险数量和质量已经成为农民工福利的重要衡量标准。由于建筑业农民工流动性大、就业合同常常得不到稳定保障, 因而他们经常陷入没有足够社会保险的困境。这也就促使我们将相关指标纳入到考量之中。第二项福利指标则是农民工医疗体检情况。由于建筑业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往往是高强度、高时长要求的, 并且他们经常

为了更大程度地提升个人工资而选择加班工作、缩减开支,因而其健康状况常常会在特殊的劳动压力下受到影响。为了节省费用,农民工很多不愿意自费去接受身体健康的检查,但是健康问题的预防对于农民工而言又是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故而,能够在单位安排下进行医疗体检,就成为了他们工作中的一项重要福利。

就家庭而言,笔者认为,农民工福利贫困的研究可以通过三个分指标加以考察:其一,农民工居住地或家乡的医疗条件,即在老家去医院(包括诊所、卫生室等)看病是否方便。同时,由于农村相对于城市的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能否获得足够便利的看病途径,实质上构成了影响农民工生存条件的相关福利中比较突出的因素。其二,农民工家庭所有成员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情况。农民工均来自于农村,而目前农村医疗保障体制对其提供的社会保障性福利主要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新农合)。考察这一指标有助于我们以医疗为切入点,衡量农民工群体的家庭受到社会保障的程度。其三,农民工家庭中的老人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新农保)的情况。近年来,农村的空心化程度比较严重,新农保的存在,一方面缓解了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的生存压力,另一方面则为需要供养老人的家庭减轻了养老负担。故而,家中老人有无参加新农保应当被视为农村家庭福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 多维福利贫困发生率及各指标的影响分析

根据上述农民工贫困指标与衡量标准,本文借助调研的数据,试图对受访农民工群体在福利贫困方面进行一个综合性的分析。首先,我们研究了k维福利贫困在k取不同值时的整体表现,并分别研究各个指标的贫困发生率。在此基础上,分析k取不同值时各指标贡献度的变化情况。

(1) k维福利贫困在k不同取值下的考察结果

对于多维福利贫困的研究,我们遵循从整体到各个维度的研究思路。从k维福利贫困在不同k值下的整体情况开始分析。在对调研获得的数据进行计算后,得到不同维度数的贫困比例、剥夺强度和多维贫困指数如下。

表1 K维状态下福利贫困人口发生率的测算

k	k维福利贫困比例	剥夺强度	多维贫困指数
1	74.4%	34.3%	0.26
2	40.0%	46.6%	0.19
3	10.7%	64.7%	0.07
4	1.8%	87.5%	0.02
5	0.7%	100.0%	0.01

通过表1对k维状态下贫困人口发生率的测算,我们可以看出:其一,一维福利贫困的比例为74.4%,意味着至少有一个指标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个体,占据了所有被调查者的3/4,这表明福利贫困现象在建筑业农民工中具有较高的普遍性;其二,根据AF方法定义可知,一维贫困的剥夺强度乘上指标数就是所有贫困个体的平均贫困指数。通过测算可知,出现福利贫困现象的所有被调查者平均在1.715个维度上面临着福利受损失的现象,即整个贫困群体的平均贫困程度处于一个中低水平,说明福利贫困问题从整体上来说还没有发展到一个过于严重的态势。

这种较低水平的贫困现象也被其他数据的分析所验证:在单个维度的指标中,有且仅有1个指标出现贫困的个体比例为34.4%,紧随其后的则是只有2个指标不合格的个体(29.3%),二者合在一起占据总调查样本量的六成,也就自然体现出福利贫困平均维度数在1维与2维之间。进一步来看,极端贫困(k=4,即至少有4个指标在贫困线之下)的个体在总的被调查者中所占有的比重仅为1.8%,说明在全部个体中,仅有极少数处于严重福利贫困状态,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整体福利贫困水平处于中低层次

的论断。不过,考虑到建筑业农民工群体基数之大,即便是小比例的样本,计算结果也是数以 10 万计的个体所处情况的反映,如果将这个结果忽略不计,很可能由于特定个体的不满而加剧社会冲突,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

(2) 福利贫困影响因素的分指标考察

在对福利贫困不同水平的分布情况和整体的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后,我们再对各个分指标的贫困比例进行研究,以期通过各个指标本身发生率的分析,以及对不同指标所处情况的对比,对组成福利贫困的各要素的状态有一个宏观的认识(分析结果见表 2)。

表 2 福利贫困影响因素对贫困的影响

指 标	社会保险	体检情况	看病条件	新农合	新农保
贫困发生数	57	194	33	87	188
贫困发生率	13.0%	44.3%	7.5%	19.9%	42.9%

表 2 显示,从看病条件来考察,只有 7.5% 的受访者认为在其农村老家看病不方便或是很不方便。这个数据相对来说很低,反映出农民工家庭成员在老家可以得到比较便利的看病条件。这得益于近几年推进的乡村医疗设施建设,使得基层乡村能够更便捷的接受医疗服务。虽然受调查的农民工来自相对开放的农村地区,故而他们的答案并不能包括相对更为贫困、封闭的村镇,这个结果的代表性也许并不充分,但本次调查的信息也反映出乡村看病条件对他们福利水平并不构成主要影响。

从社会保险情况来看,没有任何社会保险的个体占到了受访者的 13%,这说明随着政府相关部门近几年对于农民工合同、权益等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意识到了自己在工作中应当享有的社会保障权益,并且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在利用社会保险等工作相关福利吸引农民工。不过,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一方面,13% 仍然不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它所折射的很可能是广大建筑业农民工中数以千万计的缺少社会保险的群体——他们的福利缺失不能用整体成就所掩盖,必须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和解决;另一方面,对于有社会保险的农民工来说,他们能够拥有与城市户口工作者相近的保险数量吗?据各类调查和报道来看,在保险数量上,农民工还是处于不利地位。如何推进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险从“有”到“全”的变革,这是研究者和决策者都需要关注的话题。

从参加新农合的比例来看,未参加的人数大约占 20%,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大病统筹”使得农民仍然要自我承担小病开支,那么如果某一家庭自认为不会面临大病的威胁,自然就不愿意每月交钱参加到新农合中来。又比如,对于在外地打工的农民工来说,除了生小病不能报销外,一旦面临大病就必须回到定点的医院就诊才能报销,甚至在急性病突发的情况下,在城市就诊都无法享受新农合补贴,这给远离家乡的农民工带来很大的不便利,也使得他们不愿意加入新农合。新农合本身的缺陷和不方便则是阻碍其吸引基层群众、吸引外出务工人员的重要因素。

从新农保的比例来看,未参加新农保的比例高达 42.9%。造成如此高比例的原因在于,新农保要求参保人至少缴满 15 年的每年 100 元的个人费用部分,才能在 60 岁之后享受养老补贴,对于很多农村家庭来说,这样一笔费用是个不小的开支,如果家中还有其他的重大开支(比如子女上学、家庭建房、有大病人等),可能有些家庭就难以担负这样的费用。同时,目前农村频繁出现的老人自杀现象,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乡村老人养老问题所面临的困境。此外,有些家庭有养老的条件,但是却缺乏养老的意识,很多家庭不愿意将钱投入到未来才能见效的新农保上。

所有指标中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则是未参加过体检这一指标,该指标达到了 44.3%。农民工没有参加过体检的原因可以归结于三点:其一,一部分农民工群体缺少合同保障。按照劳动法的规定,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建筑业农民工应当享有体检的福利,这是健康保障的必然要求,但是,由于很多工人没有与

企业签订合同,或不知道自己应该享受相关的权利,或即便知道也无法借助合同相关条文来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的权益。其二,即便有合同保障,其中也可能没有包括体检等健康相关的内容。企业为了节约成本,可能在条约中闪烁其词或是省略掉相关的内容。其三,体检问题没有受到各方重视。就农民工个人原因方面来说,务工人员往往重视工资相关的问题而忽视自己身体健康问题;对于管理部门来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而相关部门在保障工人权利时便只满足于保护他们签了合同、拿到工资,让务工人员能够获得他们最期望的经济收入,从而维护社会稳定,至于其他不影响社会安定的福利性指标就很难受到各方的重视。

(3)各指标对福利贫困的贡献度分析

在对单个指标的福利贫困发生情况进行了分析之后,我们需要对k不同取值下的k维福利贫困下各项指标的贡献度进行测算。这种分析与单纯的指标研究相比,它可以反映出不同程度福利贫困下各个指标的影响力究竟如何;由于进一步的贫困研究和扶贫设计需要对不同贫困水平的群体进行分别的考量和制度设计,因而这种贡献度的计算是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的。通过对调研数据的测算,得到表3结果。

表3 k维福利贫困中各项指标对福利贫困的贡献度

k	社会保险	体检情况	看病条件	新农合	新农保
1	10.2%	34.7%	5.9%	15.6%	33.6%
2	10.0%	31.1%	5.9%	18.1%	34.8%
3	14.5%	17.8%	9.9%	28.9%	28.9%
4	20.0%	17.1%	17.1%	22.9%	22.9%
5	20.0%	20.0%	20.0%	20.0%	20.0%

将以上数据用折线图表示,得到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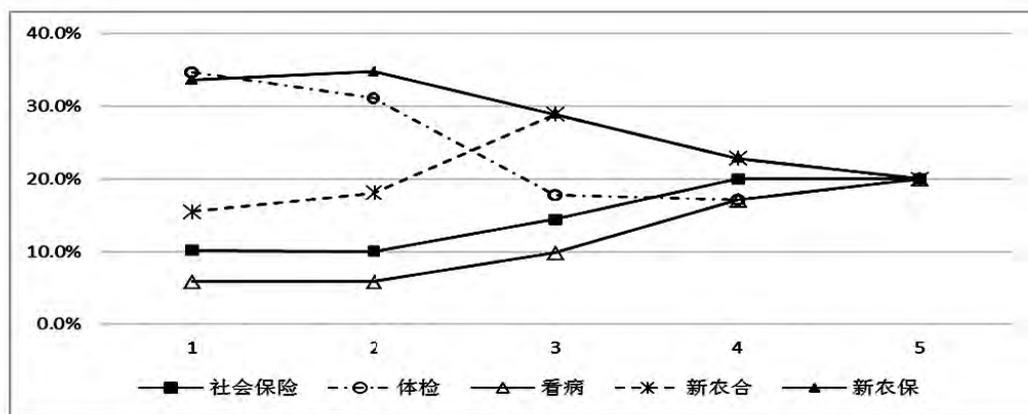


图1 各指标对福利贫困的贡献度

与贫困发生率的结果相比,贫困贡献度的数据和图表要显得复杂得多。我们以贫困水平作为划分标准,对指标贡献度进行分类衡量。对于k=1和k=2,也就是整体处于中低水平的福利贫困时,可以看到影响力最大的两个是体检情况和新农保,而后三位分别是新农合、社会保险和看病情况;虽然前两位的顺位交换了一次,但是平均起来差距不大。换句话说,对于中低程度的福利贫困,五项指标的贡献度高低与它们发生率的高低是比较一致的。因而,对于各个指标发生率的测量可以对它们在贡献度中占据的地位有一个比较准确的反映。

相比于1维和2维福利贫困,k=3和4的情况下贡献度的排名发生了很大变化。体检情况的影响力直线下滑,分别只能占有第三和并列第四的位置;新农保的贡献度也在不断下降,但是一直保有第一

位的影响度。新农合指标是先上升后下降,与新农保影响力的数值并驾齐驱;另外两项指标的贡献度则是稳步上升,在不断缩小与其他指标的差距。在 $k=4$ 时五个维度的差距已经缩小到了不到 6 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对于中高水平的福利贫困,新农合和新农保的贡献度则保持领先,意味着这个水平下基层合作的福利项目面临着比较大的缺失,导致进城务工人员的家庭缺少相关的保障。在较高程度的贫困下,社会保险和看病问题较突出,表现出农民工在一个愈发严重的福利贫困背景下,必须面临各种情况的福利剥夺。

由此可见,更高维度的福利贫困所反映的问题与较低维度反映的情况是不完全一致的,这也被相较贫困发生率而言更为复杂的贡献度折线所反映。而这些正好证明了分析不同维度数福利贫困下的指标影响力的必要性——对不同贫困群体的不同问题精确瞄准、给予不同的政策关切和政策照顾,才能将各个贫困程度的个体都覆盖到社会福利的保障中,推动整体贫困问题的解决。

3. 农民工福利贫困与整体贫困的关系

在分析完福利贫困本身之后,对于福利贫困与整体贫困的关系自然成为了本文的下一个重要话题:福利贫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工群体的整体贫困现象?不同程度的整体多维贫困下,福利贫困有多大的贡献度?这些都需要将福利贫困纳入到一个更大的贫困研究背景中,利用调研数据进行量化分析。而由于 AF 方法的本质要求,我们应当先考虑有哪些维度、哪些指标需要被纳入到衡量之中。借鉴其他研究所设定的指标,本文选定了物质、权利、精神、能力和福利五个维度共 32 个指标作为整体多维贫困的衡量标准,具体指标见表 4。

表 4 多维贫困的测度指标

维度	子维度	指 标	维度	子维度	指 标
物质贫困	收入和消费	(1) 家庭月收入不低于该地低保水平	精神贫困	社会关系和参与	(16) 与班组长、劳务公司经理关系正常
		(2) 家庭日均消费不低于 1 美元/天			(17) 工地上工人之间的关系正常
	工作地生活标准	(3) 有专门供自己及同事使用的冲水厕所			(18) 参加过当地举办的文化体育活动
		(4) 有专门供自己及同事使用的自来水			(19) 与城里人(例如同事、邻居)有来往
		(5) 生活用电供给充足		(20) 有业余活动	
		(6) 有主要的生活电器或设备		(21) 对打工生活条件的满意程度	
	老家生活标准	(7) 住房墙体属于砖石或混凝土		(22) 对老家生活的满意程度	
		(8) 有专门的厕所设施		(23) 对当前工作的满意程度	
		(9) 生活用水来自干净水源		(24) 有一定的教育基础(初中及以上)	
		(10) 生活用电供给充足		(25) 参加过与建筑业相关的技能/知识培训	
		(11) 有主要的生活电器或设备		(26) 身体健康状况较打工前未见恶化	
权利贫困	(12) 与用工企业签订劳动合同	福利贫困	(27) 打工期间得到过较广泛的帮助		
	(13) 最近一年没有遇到拖欠工资的情况		(28) 个人有社会保险		
	(14) 加班情况正常		(29) 参加过体检		
	(15) 工作时劳动防护用品		(30) 老家有便利的看病方式		
			(31) 相关家庭成员享受新农合		
			(32) 相关家庭成员享受新农保		

在确定了各个维度相应的指标之后,如何界定某一维度达到贫困是整体贫困分析的重要前提。传

统的 AF 方法中给出了“并”和“交”两种方案,前者要求至少一个指标不合格,而后者则要求全部指标不合格。后一种界定的贫困太过极端,很难反映现实情况。虽然第一种方法衡量标准相对宽松,但是对于考量福利贫困与整体贫困的关系来说,是一个比较简便易行的量化方案。因此,此处的分析将利用前一种方法,也就是各维度有一个指标不达标即记为贫困的方法进行分析。

(1) 多维贫困的整体情况测度

与分析多维福利贫困相类似的,本文首先对受调查的农民工群体整体多维贫困情况进行一个数据分析,作为对福利贫困与多维贫困联系的铺垫。经过测算,得到表 5 结果。表 5 数据反映整体多维贫困的以下三个特点。

表 5 整体多维贫困的测度

k	贫困人口发生率	剥夺强度	多维贫困指数
1	99.1%	73.6%	0.73
2	95.9%	75.4%	0.72
3	86.8%	79.2%	0.69
4	66.2%	85.1%	0.56
5	16.9%	100.0%	0.17

第一,普遍性。从一维贫困的数据来看,几乎全部受访对象都在至少一个维度出现了贫困现象。相比于福利贫困的情况(k=1 的比例只有 74.4%)可以发现,整体贫困的发生情况远远严重于福利贫困,进一步凸显了贫困问题的高度普遍性。

第二,程度的严重性。结合表 1 数据作深度分析可以知道,有贫困现象的群体的平均贫困维度数是 3.68(k=1 时的剥夺强度乘上维度数 5),而福利贫困的平均维度数是 1.715;同时只有一个维度贫困的群体比例只有 3.2%(即 k=1 与 k=2 的贫困发生率之差),而有且仅有 4 个维度贫困的人群占到了 49.3%(即 k=4 与 k=5 的贫困发生率之差),远远高出第二位的 3 个维度贫困比例(20.6%即 k=3 与 k=4 的贫困发生率之差)。相比之下,福利贫困则是集中于有且仅有 1 个和 2 个维度数的贫困,并且无论是剥夺强度还是多维贫困指数,整体多维贫困的相关数据都明显高于福利贫困的对应数值。这样的一系列对比很好地显示出,不同于福利贫困的较轻水平,整体多维贫困主要集中于中高程度。

第三,极端个体的贫困高发性。就福利贫困而言,k=4 的比例只有 1.8%,而 k=5 更是只有 0.7%(见表 1),在总体中所占有的比重是很低的;而就整体贫困而言,k=5 的个体比例占到了 16.9%(见表 5),超过了所有个体的六分之一。注意到这样的个体是处于所有维度都面临被剥夺的问题的情况之下,因而他们是贫困问题最直接的受损伤对象,推动着整体多维贫困问题的日益严峻。在扶贫工作愈发被重视的背景下,只有对作为扶贫重要瞄准对象的农民工群体面临的多维贫困问题给予足够关注,才能将扶贫工作落到实处,进而实现对贫困个体的精准识别,推动精准扶贫工作不断前进。

(2) 福利贫困与整体多维贫困的联系

在测算了整体多维贫困的情况之后,剩下的最后一个量化部分自然是福利贫困与整体贫困的联系。而对这种联系最为直观的分析就是贡献度的测量。借助上面所构建的指标体系,我们测算得到如下的表 6 数据和图 2 折线图。

表 6 福利贫困对整体贫困的贡献度

k	物质	权利	精神	能力	福利
1	14.8%	18.7%	25.5%	20.7%	20.4%
2	14.7%	18.8%	25.3%	20.7%	20.5%
3	15.3%	19.1%	24.4%	20.3%	20.8%
4	15.5%	20.3%	22.9%	19.5%	21.7%
5	20.0%	20.0%	20.0%	20.0%	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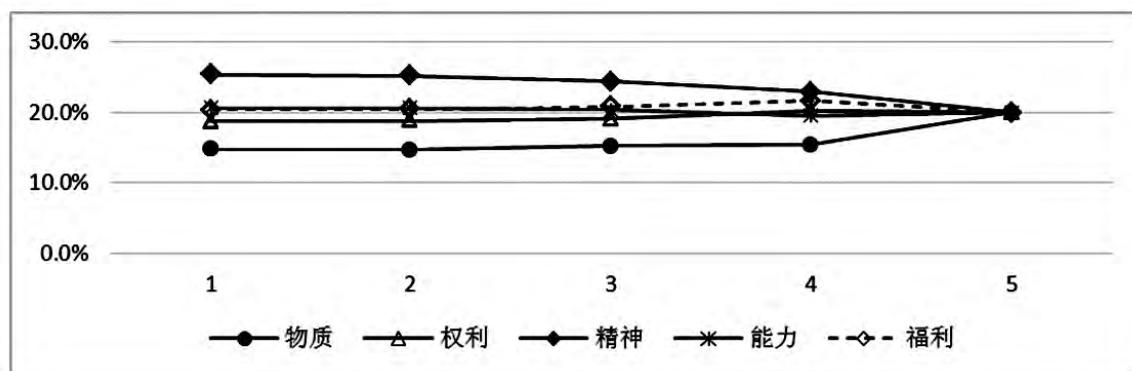


图2 各维度对整体多维贫困的贡献度

通过表6和图2数据可以看出福利贫困与整体贫困的关系:对于 $k=1$ 和2,也就是相对较低维度的整体多维贫困,福利贫困的贡献度指标排名都是第三,并且仅仅微弱落后于能力贫困的影响力。换句话说,福利贫困对于较低水平的贫困有着比较稳定的贡献度。而对于 $k=3$ 时的中度整体贫困,福利贫困的影响力超过了能力贫困,排到了第二位,并且与精神贫困的差距有所减少。再进一步,在 $k=4$ 时,福利贫困的贡献度进一步上升,与精神贫困的贡献度差距缩小到了1.2个百分点。故而,福利贫困在中高维度的整体贫困中的影响力相当之大。

考虑到上文分析中指出的,有且仅有3个和4个维度贫困的人群在总受访者中占据了超过七成的比例,故而综合考虑贡献度的排名和不同维度数贫困的发生比例,福利贫困的影响力在五个指标中排位第二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一个高排名很好地展现出,福利贫困对于建筑业农民工的影响力是研究者和决策者所必须关注的一个维度:不能处理好农民工群体在福利相关指标上面临的被剥夺问题,是不可能较为全面地减轻农民工的贫困程度的。故而,对福利贫困的研究在多维化的贫困测量中必定占据一个重要的地位。

三、以消除福利贫困为重点推进精准扶贫

社会福利是社会政策的具体化,针对农民工群体提供的社会保护和针对农民工群体制定的社会政策可以反映出农民工社会福利服务的现状。农民工作为农村转移人口,他们是福利贫困最直接的受损对象。在扶贫工作愈发被重视的背景下,只有对农民工福利贫困给予足够关注,才能将扶贫工作落到实处,进而实现对福利贫困个体的精准识别,推动精准扶贫工作不断前进。对此,今后的扶贫工作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建立相对全面的福利保障体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国的福利制度最初考虑的是改革可能出现的社会风险,基于原有的城乡结构、户籍制度,因此,我国的福利体系基本上属于查漏补缺的被动弥补型,距国外那种积极主动的提供型以及全面覆盖型还有很大差距。这种碎片化的不健全的社会福利体制,缺少可持续发展的动力,长此以往,只会加重经济社会的“贫富差距”,使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因此,今后的福利扶贫应重点推进现有的农民工“五险一金”参保率,完善社会保险制度,落实诸如公租房、廉租房等住房福利政策,同时,也应关注农民工的精神贫困、能力贫困等,缩小身份、权利和待遇的差异,提高农民工的幸福感和自我认同感。福利扶贫工作既要在数量上进行社会福利政策的全面覆盖,又要在质量上提供优质的福利支持,全面改善农民工的福利待遇。

第二,促进福利提供渠道的多元化。福利多元主义理论认为,社会福利可以由公共部门、盈利组织、非盈利组织、家庭和社区共同负担。福利多元主义在我国也有借鉴。首先,2015年9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将国企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公益类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标。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推动下,地方政府也能够更有效地满足公民的福利需要。其次,近年来,民营企业、非营利组织和社区基层组织在公益领域的贡献愈加突出。这种势头应该得到政策的更大支持。只有多管齐下,当福利提供渠道增加,公益服务的效率提高时,农民工的福利保障工作才能有质的飞跃。

第三,加强农民工群体的福利意识,拓宽农民工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尽管近年来农民工文化水平及职业技能都在不断提高,但其整体素质还处于较低水平。部分农民工由于缺乏社会福利的常识、意识及对福利内容的关注,加上信息渠道不畅,无法及时获取福利政策信息和获取申请合法福利的条件或渠道,如果某些企业为躲避社会责任而减少应有的福利供给,那么将导致农民工一方面会失去争取合法福利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会出现社会资源的浪费。因此,加强农民工群体的福利意识,简化农民工申请、享受社会福利的程序,拓宽农民工表达利益诉求、争取合法福利的渠道,则是维护社会福利政策有效推荐不可或缺的一环。

总之,福利贫困受到多个现实性的、个人或家庭的因素影响,因此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福利贫困对整体贫困有比较大的影响,会成为全面扶贫工作的一个制约因素。在2020年全面消除贫困的目标要求下,解决农民工群体的贫困问题成为了当今社会关注的一个重点。在一系列消除进城务工人员贫困的政策中,需要有配套方案来提升农民工的社会福利程度,以减少福利缺失而导致的整体贫困,从而实现精准扶贫目标。

参考文献

- [1] Fisher, G. 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rshansky Poverty Thresholds and Their Subsequent History as the Official U. S. Poverty Measure[J]. Social Security Bulletin, 1992,55(3): 3 - 14.
- [2] 阿玛蒂亚·森. 贫困与饥荒[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26.
- [3] 侯为民.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多维贫困问题分析[J]. 石家庄: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5(05):15.
- [4] 刘家鑫. 城市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初探[J]. 武汉:长江论坛,2002(4):28 - 31.
- [5] 陈辉,张全红. 基于 Alkire - Foster 模型的粤北山区农村家庭多维贫困统计测度[J]. 北京: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5(5):124 - 130.
- [6] 袁方,史清华,卓建伟. 农民工福利贫困按功能性活动的变动分解:以上海为例[J]. 北京:中国软科学,2014(07):40 - 59.
- [7] Alkire, S. , Foster J. Count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Z]. OPHI Working Paper Series, 2008:16.

责任编辑:黎贵才

Explaining the Mystery of “the Falling Rule of Profit Rate”

Ning Dianxia

Abstract: The falling rule of profit rate to has been a topic of controversy for a long time without consensus conclusion until now. The word “enhance” marginal noted by Marx in his own book is more confusing. All these phenomena constitute the Mystery of “the Falling Rule of Profit Rate”. In fact, the key point of the Falling Rule of Profit Rate lies not in whether the profit rate declined, but in whether the productivity improved and how to objectify the profit into new capital value. For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ccumulated objectification of individual capital will eventually promote the qualitative change of the total social capital, which reflects the relation betwee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social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The secret of the Falling Rule of Profit Rate is that it is the tendency rule on the starting point of value multiplication, the first profound proof in essence for this rule is the theory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the second proof in terms of reality and phenomenon is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productivity.

On Adhering to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Chang Jingsha, Wu Donghua

Abstract: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s the theory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but due to the westernization of economics in recent years, the theory has almost been emptied from the education platform in universities. The emptying is caused by multiple factors, one factor that can not be ignored is the systemic defect in teaching plan of the current education. Teaching of economics in 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been being strengthened on the hypothesis of “economic man” for a long time, which has clearly exposed a trend that the students increasingly lean to the theory of hypothesis of economic man. Facing this critical situation, we must implement systemic adjustment to the teaching plan of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return to the educ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o strengthen the students’ theoretical thinking and urge them to cast off the adverse influence of market economy due to the westernized education, and to build up fresh forces complying with the requir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Demographic Factor’s Effect on the Economic Growth in Northeast China

Wang Xiaofeng, Zhang Zhengyun, Wen Xi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economic growth rate in northeast China continues to decline, the economic growth is trapped into a dilemma. From the observation for a relatively long time, demographic changes in northeast China, especially the changes in working-age population, have a certain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The improvement of labor productivity is the most primary sources for economic growth in northeast China; the changes in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labor bring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Jilin province, but it bring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Heilongjiang and Liaoning provinces; the contributions of demographic factors i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northeast China have declined. In order to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northeast China should invest more in human capital; it should break the restriction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form a labor market an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hat unifies urban and rural area; it should also implement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provide incentives for couples to have new borns by policy, and it should also formulate and improve its policies to attract working-age population to form a population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economic growth.

Study on Welfare Poverty Measures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and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Sun Yongmei

Abstract: Study 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shall not focus exclusively on material poverty, it should break the traditional method in which the poverty is measured only by labor remuneration and consumption, and we should introduc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theory into the study to establish a measurement system with multiple indicators. Welfare poverty, as a latent poverty in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has some hidden and complex natures, which should be put into the scop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and be emphasized. From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welfare poverty of migrant workers through AF method, we can see that, welfare poverty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reflects different problems. For the medium welfare poverty, the welfare security degree of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care system and new rural so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system is still low, for the severe poverty, difficulties in getting social security and medical treatment are still the major impacting factors to welfare poverty of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Chinese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should focus on welfare poverty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